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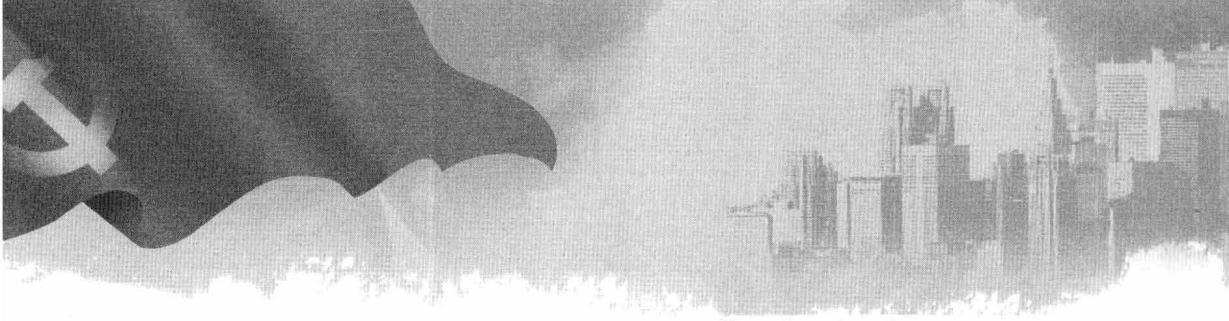


主编 ◎ 韩锐 毕德林 盛根 王玉云



GAIGE KAIFANG YILAI
GUANGDONG SHEHUI BIANQIAN
YU DANG DE XIANJINXING
JIANSHE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社会变迁与党的先进性 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社会变迁与党的先进性 建设

主编 ◎ 韩 锐 毕 德 林盛根 王玉云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社会变迁与党的先进性建设/韩锐，等主编.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5361 - 4079 - 0

I. ①改… II. ①韩…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广东省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1278 号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510500 营销电话：(020) 87551597 网址： http://www.gdgjs.com.cn
印 刷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8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社会变迁概述 / 1

- 一、广东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 / 2
- 二、广东社会变迁的总体概貌 / 5
- 三、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的广东社会变迁 / 11

第二节 广东社会变迁的独特贡献、历史启示和严峻挑战 / 13

- 一、广东社会变迁带来的独特贡献 / 13
- 二、广东社会变迁的历史启示 / 16
- 三、广东社会变迁给党的先进性建设带来的严峻挑战 / 20

第三节 研究广东社会变迁与党的先进性问题的重大意义 / 24

- 一、社会变迁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互动关系 / 25
- 二、研究社会变迁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意义 / 30
- 三、研究方法与逻辑结构 / 35

第二章 广东经济发展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 37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的历程与成就 / 37

- 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的历程 / 37
- 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 44

第二节 广东经济发展与党的先进性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 / 49

- 一、新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新格局带来的全新挑战 / 49
- 二、对外开放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的挑战 / 50
- 三、粤港澳经济合作面临新的挑战 / 51
- 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 / 52
- 五、现代化建设亟待人们科技文化素质提高的挑战 / 53
- 六、新经济组织迅速发展对扩大党组织覆盖面提出的挑战 / 54

第二节 广东党组织自身变化对先进性建设的挑战 / 175

一、党员队伍内部结构的变化对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影响 / 176

二、“两新”组织党建工作面临的九大矛盾和问题 / 178

第三节 强化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对策建议 / 182

一、不断提高广东党建科学化水平，永葆党的先进性 / 182

二、进一步优化党员队伍内部结构 / 190

三、进一步探索党建新领域里的工作机制和模式 / 194

第七章 结 论 / 201

第一节 广东社会变迁是全面的变迁 / 201

一、广东社会变迁是政府主导型与民众自发型的有机结合 / 201

二、广东社会变迁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全面变迁 / 204

三、广东社会变迁是符合规律的社会变迁 / 206

四、广东社会变迁是全国社会变迁的先导和缩影 / 208

五、广东社会变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 211

六、广东社会变迁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 213

第二节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广东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条件 / 216

一、与时俱进的大政方针是广东社会变迁的政治基础 / 216

二、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是广东经济社会变迁的思想基础 / 219

三、本固基强的组织力量是广东社会变迁的组织保证 / 220

四、从严治党的认真态度是广东社会变迁的制度保障 / 223

第三节 党的先进性必将在社会进一步变迁中更加彰显 / 225

一、挑战就是动力 / 225

二、迎战必然发展 / 226

主要参考文献 / 227

后 记 / 232

绪 论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试验田”、“窗口”、“示范区”和“排头兵”，广东成为改革的首发阵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广东社会变迁的发展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一场历史性实验的窗口、缩影与先导，同时又是一块生动记录中国经济社会演变的“活化石”。

广东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为全国树立起一面旗帜，在党的建设方面也为全国树立起一面旗帜。广东的社会变迁与党的先进性建设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广东的发展成就生动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体现了党的先进性。研究广东社会变迁与党的先进性建设及其关系问题，系统地回顾广东社会变迁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互动历程，发掘并总结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互动规律，对于深刻认识和始终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社会变迁概述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广东历史揭开了新篇章。同全国一样，改革开放之前，广东既经历了经济迅速恢复和社会蓬勃发展的喜悦，也饱尝了艰辛曲折的痛苦磨难。在物资短缺和需求紧迫的严峻形势下，广东初步建立起了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制度和物质技术基础。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特别是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广东经济社会经历了一个痛苦曲折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之前的广东，犹如一只双翅受缚的鲲鹏，期盼翱翔蓝天但却无法起飞。下面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对改革



开放前广东的社会图景即广东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原点作一介绍。

一、广东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

(一) 经济发展长期缓慢

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主要不是依靠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客观的激励机制，而是依靠一种革命激情的感染、工人和农民翻身解放的热情与意识形态的鼓舞。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经济管理体制形成并不断强化，单一的所有制经济结构与传统类型的产业结构日益固化；片面追求“高速度”，积累率过高，又采取低工资政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人们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当时出于战备考虑，广东未被列入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地区，国家赋予广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工业投资较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处于次要地位。由于以上原因，尽管广东具有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的良好条件，但其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从而导致广东经济呈现出农业发展缓慢、工业低速增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和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

大体说来，改革开放前，广东经济在全国居中下游水平，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处于全国平均值以下，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影响力较弱。据统计，1953—1978 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仅为 3%，均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1978 年，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365 元（当年价），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2 元；人均工业总产值 395 元（当年价），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45 元。^① 1978 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为 185.85 亿元（按当年价计算）^②，排在全国各省（区、市）第 7 位^③。

(二) 政治发展背离正确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初步建立起社会发展体制，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制度基础。但新中国成立后持续 20 年之久的“左”倾错误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广东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在全国宏观政治背景下，广东的政治发展也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政治发展一度背离了正确轨道。

^①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广东省志·总述.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181.

^②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10—2004.9）.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280.

^③ 李军晓. 策路蓝缕，先行一步——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研究.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29.

一是人民内部矛盾被混淆，敌我关系被颠倒。20世纪50年代广东发生的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严重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挫伤了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爱国爱乡的热忱。二是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建设和民主法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良好的社会风气等方面也受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法律遭到践踏，法定的选举无法进行，广东各级人大陷于混乱和停顿状态，广东各级政府的发展也陷于困境，统战工作处于停顿、取消状态，民主党派停止了一切活动，广东各级政协被迫停止了活动。三是广东各级党组织受到破坏。广东按照“五十字建党方针”，搞“吐故纳新”，结果造成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党员因被戴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而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出党，而一部分不符合条件的人特别是造反派的一些大小头目则被吸收入党，造成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不良后果。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党员代表大会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等遭到破坏。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执政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逃港之风最严重时，广东边境一些公社、农村呈现出“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① 的荒凉景象。众多的广东人离乡逃港，不仅流失了大量精壮劳动力，荒芜了田地，使经济蒙受损失，而且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极大地削弱了党的形象和威信。

（三）文化发展经历曲折

广东文化源远流长。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广东文化事业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前进，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与输送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但是，和全国一样，广东文化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经历了曲折，在某些方面甚至受到严重的破坏。

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广东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精神生活和大众文化极度贫乏，岭南人的精神传统一度受到严重压制。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对广东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使广东高等教育事业遭到空前浩劫。1978年，在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人数，全国是7.9人，广东只有6.4人^②，排在全国第18位^③。“文化大革命”对广东的普教事业也是一次大摧残，耽

^① 南方都市报.深港关系四百年.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136.

^② 黄勋拔.当代广东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202.

^③ 李军晓.筚路蓝缕，先行一步——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33.

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成长。在社会科学方面，广东高等院校中断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全体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教授、专家、学者遭受批斗。在自然科学方面，一大批科技界知名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横扫”、“打倒”的对象。在文学创作方面，许多优秀作品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服务”，“不塑造工农兵”，“宣扬资产阶级情调”，文艺机构、团体几乎岌岌可危，大部分作家被称为“修正主义分子”、“封资修代言人”，被批斗、游街，被迫下乡、下干校改造，文学创作陷入了困境。

（四）社会发展长期陷于停顿

改革开放前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有悖于社会公平公正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加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使广东社会建设面临着诸多问题，举步维艰。

首先，改革开放前广东社会阶层结构比较简单，社会阶层分化缓慢，社会阶层结构极不合理。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模式构成了广东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框架，其中知识分子在本质上也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阶层分化缓慢，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其次，改革开放前广东社会整体上呈现“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1978年以前广东城市社会整体结构分成两个层次，一方面是处于权力核心层面的党政组织，另一方面是依附于单位和基层行政组织的，由以家庭为核心的、分散的、缺乏个体选择的、城市居民组成的社会基层层面，整体上呈现“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导致国家对一切社会生活的包揽和控制。在此背景下，广东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道—居委会体系（简称“街居制”）为辅的“两条线”管理体制：“一条线”是政府—单位—职工，“另一条线”是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前者是管理的主体模式，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实现了国家政权对城市基层社会的强控制。再次，改革开放前，广东省社会保障制度实行传统的政府保障体制，其主要特征是国家—单位保障。这种社会保障呈现出“广覆盖、低水平”的特点。最后，改革开放前广东城市破败不堪，设施落后。由于工业化进程缓慢，农村人口没有随着工业的发展向城镇转移，城市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譬如说“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之称的汕头，150多年前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就说它是远东“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

20世纪30年代有“小上海”之称，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却依然是满目疮痍，贫穷落后。

二、广东社会变迁的总体概貌

沐浴着改革开放“三个春天”^①的朝阳雨露，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广东历届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广东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组织自身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广东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突破

首先，实现了从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省份向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

1978—2007年，全省GDP（国民生产总值）总量增长41倍，人均生产总值翻了四番，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8左右并先后超过了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已处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从1985年起，广东GDP总量已经连续25年稳居全国第一位。其中，广东GDP继2001年用了23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之后，在2005年、2007年、2010年分别只用了4年、2年、3年的时间先后突破了第2个、第3个、第4个万亿元大关。^{②③}广东人均GDP也由1978年的247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4 080美元，翻了四番。到2010年，广东人均生产总值达46 990元，折合近7 000美元，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④从1992年邓小平提出广东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算起，广东的经济规模追上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分别只用了6年、11年，超越台湾省用了15年，全省总体实现小康，珠江三角洲已率先步入宽裕型小康。^⑤广东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大省、利用外资大省和经济开放度最高的省份。

^①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广东发表了“南方谈话”；2000年春天，江泽民同志在广东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春天，胡锦涛同志在广东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② 蒋斌，梁桂全. 敢为人先——广东改革开放30年研究总论.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5.

^③ 雷辉. 粤去年GDP破4.5万亿. 南方日报，2011-01-07（A2）.

^④ 陈枫，赵杨，陈邦明，等. 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欧广源主持，黄华华作政府工作报告，汪洋、黄龙云等出席. 南方日报，2011-01-23（A1，A4）.

^⑤ 蒋斌，梁桂全. 敢为人先——广东改革开放30年研究总论.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5.

其次，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

所有制结构方面，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和补充的局面。产业结构方面，广东产业结构逐步实现现代化经济模式的转型，经济已经逐步非农化，第二、第三产业撑起了广东经济。服务业与制造业这两个“双轮驱动”，已经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支撑。

再次，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广东积极加强对外往来和友好合作，努力推进与港澳地区和内地省份的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最后，实现了从温饱向宽裕型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 30 多年是广东人民群众得到最多实惠的时期。1978—2007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了 43 倍和 29 倍，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公共服务明显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达到宽裕型小康。

（二）广东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第一，恢复重建地方民主政治，积极探索地方立法新路，夯实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大胆探索，在全国先行地方立法。1981 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通过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1981 年、1992 年和 1996 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专门决议，先后授权广东省及其深圳、汕头、珠海等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广东省地方立法的探索之路大致经过初步探索、初步发展、全速推进和稳步发展四个阶段。^①从 1981 年至今，广东的经济特区立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具有立法权的广州等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体现地方特色。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广东省在地方立法之初，在国家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勇于“打破常规，急用先行”，“超前立法，引导改革”，大胆开展先行性、试验性的立法，大胆探索地方立法的新领域，为全国和其他省份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一方面，在总结创立阶段立法的实践经验，使地方立法工作制度程序化、规范化。另

^① 李绍新，张富强. 跨世纪的法治系统工程——广东依法治省的理论与实践.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130—138.

一方面，使制定的法规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促进民主立法、科学立法。

第二，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确立依法行政的理念。

广东是国内最先提出并确立依法治省方略的省份，创造了法治建设的“广东经验”，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而且对全国范围内的法治建设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围绕回归政府本位，实现政府角色的变化与转型，广东基本实现了从经济目标优先向社会目标优先的转变、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型财政体制的转变、从封闭型行政运行体系向公开透明型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变、从管制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的转变，逐步由一个高度集权的、全能型政府向依法运作、高效透明、廉洁公正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第三，有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铺平向法制广东转型的道路。

在经历 1954—1978 年期间“四次孕育，三次流产”^① 的艰难历程后，1979 年 12 月 17—26 日召开的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设立省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此拉开了在广东省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的序幕。^② 广东人大已非昔日的“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广东人大的腰杆直起来了，广东人大的图章硬起来了，真正发挥了“把好官位子”、“管好钱袋子”的作用，以其广东特色成为地方人大建设中的一个亮点，形成了地方人大建设中的“广东现象”^③。人大“广东现象”在广东首创人大“直通车”制度后，获得了更多民众的认可。

随着执政党倡导思想解放、力主改革开放、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推行党内民主、广东人大制度的逐渐健全和强势运作、广东政协日趋活跃、基层群众多元自治、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媒体舆论空间相对开放等，广东已经成为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自治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实验地，公共权力运作中的民主元素渐渐增加。由此，广东民众对执政党和政权系统的认同度与支持度进一步得到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执政党和政权系统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①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 地方人大 20 年：上.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64—66.

^② 肖滨，等. 为中国政治转型探路——广东政治发展 30 年.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03.

^③ 陆介标. 人大工作纵横谈.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422—424.

（三）广东精神文明建设方兴未艾

第一，精神文明建设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广东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积极推行科技兴粤战略，并实行“排污不排外”和“有所引进，有所抵制”的方针，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风格和广东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之路。广东始终以注重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群众的愿望、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作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和提高创建水平的工作着力点，使创建活动的要求与群众的切实需要相契合，从而激发、唤起群众的自愿自觉意识，有效地吸引了群众的广泛参与，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广东始终把做好人的文章、培育“四有”新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根本出发点，大力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构建层次分明、环环相扣的道德建设体系，全面提升全省人民的现代文明素质。

第二，文化大省建设迈上新台阶，文化软实力快速跃升。

文化是明日的经济，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是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历了经济第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经济大省和文化大省建设并重的三个阶段，广东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大众文化、企业文化、城乡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繁荣景象。广东逐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发展日益繁荣。从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电影院、文化站等到大型文化广场、艺术中心等大批文化基础设施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以浓郁的岭南文化为底蕴、以改革创新时代精神为精髓的文化精品佳作迭出；担当走向世界的桥梁作用、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的广东对外文化交流高歌猛进、绚丽多彩；以增强文化事业活力、探寻实现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为根本出路的广东文化事业体制改革渐入佳境。

第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广东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岭南文化和人文精神。

在当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先行一步的广东更加需要汲取和弘扬广东人文精神的基因，注入时代的元素，铸就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广东的改革进入深刻转型的攻坚时期，在广东省委的倡导下，全省广泛开展了“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大讨论，提炼概括出“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再次激发了广东人昂扬的斗志，为广东的新一轮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四）广东和谐社会建设开创新局面

改革开放使广东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追求社会全面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广东社会变迁的

本质。

第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珠江三角洲发展的历程就是最好的例证。广东城镇化建设已显规模，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基本连成一片。其间，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通信等方面建设取得巨大进展，为广东经济腾飞、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创建了坚实的外部环境。

第二，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保障建设得到加强。

广东扶贫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97年底，提前3年在全国率先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发展的基础条件明显改善；2000年下半年，广东省开展了扶贫“两大会战”，初步解决了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交通和用水等突出难题；2002年底，全省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2007年，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广东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腾笼换鸟、造凤引凤”，促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2007年秋，广东省率先在全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本费。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广东历届省委、省政府践行党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最高政治承诺，以切实解决与人民利益攸关的问题为核心，建立起与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就业、城乡特困家庭的生活保障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问题，并开始了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与试验，加快了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进程，社会救济体制逐步形成规模，最大限度地凸显了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保障。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发展成果正在越来越多地为全省人民共享，一个“富裕、公平、活力、安康”的和谐广东初显轮廓。

第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权制度建设得到加强。

广东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治理，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确保经济建设顺利进行，“零容忍”带来了南粤治安的新面貌。广东首创政府法律援助，服务社会弱势群体。1995年11月，广州市司法局率先在全国设立了第一家由政府创办的法律援助中心，开始了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扬经过视察论证后将中心的工作称为“广州做法”，并批示“可向全国介绍”。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将中国的法律援助由自发性的民间善举上升为规范化的政府行为，是中国在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方面与国际社会进一步接轨的重大开拓成果，标志着中国在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迈进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得到提高。

从2004年以来，广东群体性事件发生率连续呈下降趋势。广东率先在

全国建立信访督查专员制度和省市领导亲自包案处理制度。全面启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将群体性信访事件纳入法制化轨道，有效地解决了一大批历史积案和现案，使一些多年反复上访的旧案降为零复发。广东发展迅速，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对此，广东制定应急预案，及时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危机管理和预防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广东还切实解决一大批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广东省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从全局的和战略的高度给予重点把握。经济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也执全国之牛耳。

（五）广东党的建设成就辉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敢于创新、敢闯新路、敢为人先，取得了党的建设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之初的拨乱反正，“南方谈话”后的体制大转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的洪流无不考验着广东各级党组织。广东省委紧密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坚持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以实施固本强基工程为重点，不断创新党建工作理论、党建工作机制、党建工作载体，在解放思想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在巩固基础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改革实践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在对外开放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形成了具有广东特色的、符合基层实际的党建工作经验，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坚定了人民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

第一，农村党建工作扎实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了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堡垒作用。广东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领路人和农村稳定的“稳定器”，创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机制，逐步构建起城乡统筹互助的基层党建格局，使农村党建工作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农村党建与农村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互赢。

第二，国企党建工作不断完善，开辟了新局面，形成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广东国企党建新模式。广东国企党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改进国企党建工作有机结合，创造了分类管理模式、长效机制模式、“大党建”模式等多种管理模式。

第三，社区党建独具特色，探索出了新路子，惠及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广东努力构建社区党建工作的有效运行机制，搭建社区党建服务平台，凸显了广东社区党建工作的特点。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代背景下城市

基层社会重建的产物，广东社区党建经历了不断探索、创造的过程，建立了工作机制，找准了工作路子，形成了工作模式。

第四，“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党建工作思路和机制。广东“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结合广东“两新”组织发展快、变动多、规模小、差异大以及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形成了一系列党建工作思路和机制，发挥了“两新”组织中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广东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第一家私营企业党委、第一家商会党委、第一家合资企业党委、第一家流动党员管理中心，形成了具有广东特色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建经验。

第五，党的制度建设在改革实践中得到加强。以改革精神建设党，在探索改革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广东省委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确定的党建思路。在改革实践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始终贯穿于广东改革开放 30 多年党的建设实践，是对广东党的建设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归纳总结，是对广东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最好诠释。

第六，广东高度重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抓得早、抓得紧、抓得实。初步构建具有广东特色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是广东省委加强党的建设的突出特点。

三、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的广东社会变迁

如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界限，前后两个时期刚好在新中国成立的 62 年里各占大体 30 年时间（下面笼统以两个 30 年论）。在这两个 30 年的关系和联系上，要防止和反对两个模糊甚至错误的倾向。比如，有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之前的 30 年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因而以后 30 年否定前 30 年。有的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甚至认为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因而以前 30 年来否定后 30 年。如何正确认识这两个 30 年的关系，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新中国的历史，也关系着能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方面，不能用后 30 年否定前 30 年。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党在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犯过不少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的、长时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过严重损失。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

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①，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必要的国际环境。当然，在前30年里，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没有改革开放后那么显著。但这绝不表明那段历史对于后30年无足轻重、可有可无。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前30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②。这是前30年的基本方面，是我们总体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只要把那段历史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同上述基本面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看得很清楚。

另一方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30年。看不到后30年对前30年的巨大超越，混淆前后两个30年的显著区别，就看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当然，同时应当看到，后30年对前30年的这种超越并没有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看不到后30年与前30年的这种连续性，把前后两个30年割裂开来，就看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

正确理解和认识两个30年的关系，关键是要认识到两个30年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社会基本制度、国家核心领导力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区别，更不是执政党的宗旨和远大奋斗目标的区别。在这两个30年里，我们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领导国家的核心力量都是中国共产党，居于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宗旨和最终奋斗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和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两个30年之间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继承发展的。只有这样看待，才能对新中国的60年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6.

^②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7.

^③ 朱佳木.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新中国的两个30年——访中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11）：10—15.